

董志翹
蔡鏡浩
著

中古虛詞
語法例釋



吉林教育出版社

董志翹 蔡鏡浩 著

中古虛詞



語法例釋

吉林教育出版社

(吉)新登字02号

中古虚词语法例释

董志翘 蔡镜浩 著

责任编辑：李 静

封面设计：王劲涛

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 850×1168毫米32开本23.375印张6插页540,000字

发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29册 定价：14.50元

印刷：长春科技印刷厂 ISBN 7-5383-2344-9/G·2089

前 言

一

汉语历来就缺少形态变化，因而虚词在语法中的作用就十分重要。所以，我国的语法学虽然建立得比较迟，可是对虚词的研究与训释却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期。象《诗·周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毛传》：“思，辞也。”这是较早的训释虚词的例证。而文言虚词的专著，亦远较其他语法著作产生得要早。清代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则是汉语语言学史上研究虚词的名著。《马氏文通》问世以后，关于古汉语、现代汉语虚词的词典更是不断出现。这对古汉语、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及广大读者的阅读和使用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对中古及近代汉语的虚词研究一直是比较薄弱的环节。对这一时期的虚词的解释仅散见于有关语法史的论著中，如吕叔湘先生的《汉语语法论文集》、《近代汉语指代词》等，以及属于训诂性质的辞书中，如张相先生的《诗词曲语辞汇释》、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等。因为材料分散，所以读者寻找很不方便，而且在训诂著作中只偏重于词义的考释，对语法特点很少分析。

我们编写这本著作，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具体说来，主要目的有两个：

1. 为阅读、整理、研究中古典籍者提供方便，解决在虚词上遇到的困难。如有的中古特殊虚词，注本往往不加注释，而辞书亦不载有关用法，读者会感到困难。如“行看”，在唐宋时屡见，《汉语大词典》收有这一条目，但仅列两个义项：“且看”、“复看”。这些其实都是状中词组的用法，作为双音节词，它应该是一个副词，有“即将”义。本书中重点收列了这类条目。

2. 为汉语史研究提供断代的资料。本书收集了中古常用的新虚词、新用法，可作为研究各类虚词变化的素材，并为进一步归纳、总结语法规律提供依据。

我们给中古所定的时限是魏晋至宋代。关于汉语史的断代是一个仍有分歧的问题。王力先生认为：“公元四世纪到十二世纪（南宋前半）为中古期”。我们的观点与他相仿。他分析了中古时期的五个特点，其中四个与语法有关：“（1）在口语中的判断句中系词成为必需的句子成份；（2）处置式的产生；（3）完整的‘被’字式被动句的普遍应用；（4）形尾‘了’、‘着’的产生”。（《汉语史稿》上册第35页）

还可补充的理由是：

1. 从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来看，魏晋南北朝是两者分离的起始时期，是古白话的露头，而宋代则是古白话走向成熟，大批出现在文献中的时期。

2. 在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与秦汉不同的重要语法成分和现象，有其明显的特点。除了王力先生提到的判断句、被动句外，还如第三人称代词的重要变化、名词前缀“阿”的产生、副词大量双音节化的趋势等都是例证。

3. 在魏晋或隋唐开始露头的新的语法成分和现象，往往到宋代才走向成熟，并成为主流。上面提到的“了”、“着”是两个证据。还如名词后缀“儿”、前缀“老”、表复数的后缀“们”、

助语“里”等，均有类似的发展过程，所以对这些虚词的考释，往往上溯魏晋、隋唐，下及宋代，很难分割。故作这样的断代亦是为了写作的方便。

本书为《中古虚词语法例释》，主要是对中古虚词加以训释，其间解释的中古虚词包括：代词、助动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词缀。

收入书中的虚词主要有这样三种类型：

1. 这一时期新出现的虚词；
2. 虽然在汉代已经萌芽，但主要流行于这一时期的虚词；
3. 原有词义及语法功能在这一时期有重大变化的虚词。

本书所列义项、用法不求全面，凡是上古已有的常见用法一概不列，只列中古特有的用法。

本书收词的范围比较宽，尤其是副词、介词，我们介绍的某些常作状语的词义又较特殊的词，可能对它们的词性会有不同的看法，其目的是给读者提供方便。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在单音节词后附了不少双音节、或多音节的条目，也并不意味着这些条目都已成了双音节、多音节的虚词，它们往往还是词组，有的还未固定。

为了让读者除了了解单个虚词的用法外，对中古汉语新虚词、新用法的总貌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本书还附了一个“词类索引”，力图勾划一个总体轮廓。

二

与文言、现代汉语虚词词典相比，本书在撰写上有以下四个

特点：

1. 注重词义和用法的考释

对一般文言虚词，因为研究时间较长，有从《经传释词》到《词诠》、《古书虚字集释》等一大批成果，所以对大部分虚词来说，研究已有定论。而中古虚词的研究基础比较差，仍有不少新的虚词、新的用法尚未被人很好认识。所以在撰写本书时，我们化了不少功夫来作考释工作。

① 发现新的虚词。有的产生于中古的虚词沿用至今，人们当然比较熟悉，如“就”、“把”。有的却仅出现在那个特定的时期，解释就困难一些。如“减”作为动词，有“减去”义，这是常见的，而由此引申，有“不足”、“少于”义，就较少见。而由此再虚化成了副词，有“将近”、“大约”义，常置于数量词之前：

王右军年减十岁时，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

（《世说新语·假谲》）

“减十岁”即“将近十岁”。

“减”的这种用法仅见于魏晋至唐代，流传亦不太广。故一般辞书及谈当时称数法的论文均未论及。我们在词典中详细考释了它的用法和词义。

还如：“曼”在魏晋南北朝时，可以是一个介词，用来介绍动作发生的时间，一般用在句首，相当于“趁”、“及”，如：

若是我亲善知识者，曼我头有所直，应当劝我作礼，使我将来得诸天身、贤圣胜头。（晋安法钦译《阿育王传》卷二）

现今的各种辞书均未收入这一介词，而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九则已讲到了，他说：“曼今：莫盘反，高昌谓闻为曼。”“闻”亦有“趁”、“及”义。可见“曼”的这一用法，

是来自于高昌语，主要用在佛经中，人们当然不会注意到。

在新的虚词中尤其要注意的是双音节的虚词，这在上古时还较少见，而中古时则大批出现。有的为人熟知，如“什么”。有的则不然，如“转”在中古时是一个副词，有“更加”义，这已有人提及，但由“转”构成的双音节副词，除了“转益”因为杜甫的诗句“转益多师是汝师”出名，而收入辞书外，其他的则很少注意到。其实，在当时更普遍使用的是“转更”、“转加”等。在本书中就收了一批这样的双音节虚词。

② 发现新义和新用法。有的是上古虚词到了中古有了新义、新用法，是应注意的。如“来”作为语气助词，可用在祈使句的末尾，表示祈使的语气，这在先秦后期就已存在，亦早有人论及。可是到中古，“来”的用法扩大了，还可以用在陈述句、疑问句的末尾，既表动作的完成，又兼表语气，相当于“了”。如：

和尚又问：“你到曹溪得个什摩物来？”（《祖堂集》卷四）

此处地土，某曾亲到来。（宋沈括《乙卯入国奏请》）

有的是中古的新虚词，用法多种多样，而人们仅发现了其中的几种，需补充、增加。如“合”在中古最常见的是作助动词用，不少辞书已列为义项。此外，“合”还可以是副词、介词、连词，这就不为人所注意。本书中都予以考释，如：

恰如园中瓜，合熟即须摘。（唐王梵志《向命取人鬼》）

“合”是副词，犹“刚”，表示时机正好。

蔡还，见谢在焉，因合褥举谢掷地，自复坐。（《世说新语·雅量》）

“合”用作介词，介绍连及的对象，犹“连……一起”。

波婆伽梨而语王言：“我遭不造，船重沉没，迎良伽梨，并诸贾人，合诸珍宝，尽没大海。”（北魏慧觉等译《贤愚因缘经·善事太子入海品》）

“合”是并列连词，犹“连同”。

再如“苦”是中古相当流行的副词，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云：“苦，甚辞，又犹偏也；极也；多或久也。”列的义项不少，然而仍少了一种用法：表示范围的周遍性，犹“全部”、“尽”如：

令曰：“卿似欲致谏，故以左右有人，不肯苦言，朕为卿屏左右，卿其尽陈之。”（《魏书·张普惠传》）

“苦言”即下文的“尽陈之”。

③ 探求虚词之间的内在联系。有些虚词意义相同相近，而形体各别，实质上它们之间有着血缘关系，如果能理清这些线索，不仅可以明了这些虚词的来源，确定这些虚词的意义，对于成系统地掌握这些虚词，亦有帮助。

如“适来”一词，中古常用于动词或整个句子前，表示动作行为发生于不久之前，为时间副词，可译作“刚才”。然在中古文献中，又有“商来”、“商来”两词，其义亦为“刚才”，如：

道安曰：“商来问贫道所讲经文，当是大《涅槃经》，善庆闻之，分明记取。”（《敦煌变文集·庐山远公话》）

远公曰：“商来之声，便是贫道念经之声。”（同上）

通过《敦煌变文集》中“适来”、“商来”、“商来”同义互用的许多例证，我们发现，“商”乃“适”之俗书省减，“商”

乃“商”之形近讹文。它们更是一个词的不同形体。

更有“上来”一词，《汉语大词典》释为“以上”、“上述”。袁宾《禅宗著作词语汇释》释为“以上”、“刚才”。虽然释为“刚才”是正确的，但仍受字形影响，加释“以上”一义。实质上，“上来”即由“商来”变化而成。如：

道安答曰：“……上来听说言词，谨答例皆如是。”

善庆曰：“阇梨商来所说言词，大远讲赞，经文大错，总是信口落荒。”（《敦煌变文集·庐山远公话》）

从上下文，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上来”、“商来”互文同义，不过是一个词的不同形体而已，而源头还在“適来”。

④ 辨识正误。编写虚词词典当然要吸收前人的大量考释成果，不过这亦有一个辨识的工作，不能盲从。上面提到的“上来”即是一例。还如对“不妨”，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解释是：“也是甚辞，‘很’的意思。”举的例证如：

我有一女在家，性行不妨柔顺。（《敦煌变文集·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

《汉语大词典》亦采用了这一解说。

而袁宾先生的《禅宗著作词语汇释》亦考释了此词。解释是：“表示肯定语气，相当于‘自然、固然、真是’。”

两相比较，袁说比较正确。“不妨”在上引例证中作“很”讲，似乎亦讲得通，可是我们还发现下面这类句子：

元和中，僧鉴虚本为不知肉味，作僧素无道行，及有罪伏诛，后人遂作鉴虚煮肉法，大行于世。不妨他僧为之，置于鉴虚耳。（《因话录》卷四）

这里的“不妨”显然不能作程度副词讲，而且是表示十分肯定的语气，是说此事确实是别的僧人做的。而按语气副词的用法去解释《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中的全部例句，亦都很通顺。由此

可见程度副词之说显然是错误的。

正因为编写中古虚词词典还兼有考释的任务，方法上就与一般文言虚词词典略有差别，我们的做法主要有三点：一是精心挑选有助于考释的典型例证。所谓典型例证是指有利于比类归纳，不产生歧义的，如上引《因话录》的例证；还如有互文、异文可以参照的，如上述“适来”、“商来”、“上来”的例证。二是把有关的单音词与复音词、词组归在同一条目下，互相参证，如“转”的下面就列有“转更”、“更转”、“转加”、“加转”、“更加转”、“转益”等附目。“颇”下列有“颇甚”、“颇极”、“颇更”、“颇益”。“偏”下列有“偏最”；“审”下列有“审定”；“殊”下列有“殊总”。像“转”的有关例证，可以帮助证明“转更”等附目是同义并列结构，均有“更加”义，而由“转”构成的这些附目，亦更证明“转”是一个程度副词。三是追溯演变来源，可使读者不但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令人更加信服。这在下文还要详谈。

我们在编写的过程中体会到对虚词考释功夫的深浅直接关系到本书质量的高低。

2. 突出语法性的描述

如上所述，对中古虚词的研究，需借助于训诂学的考释。但仅仅用传统训诂学的方法来解释虚词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著作，缺少语法描述，往往不能准确解释虚词。如张柏《诗词曲语辞汇释》解释“底(二)”时说：“底，犹这也，此也。”例证如：

烟钟能底急，催我入城堙。(宋杨万里《游蒲间晚归》)

解释“底”(三)时又说：“犹许，犹云如许或何其”。例证如：

柳映江潭底有情！望中频遣客心惊。(唐李商隐《柳》)

(见该书第86—87页)

仔细体会一下上述例证中的“底”，意义都差不多，实在看

不出分列的必要。

如果作一下语法考察，就能发现，“底”是一个指示代词，表示近指。如用在名词前作定语或单独作主语，则单纯表示指示，就相当张相“底”（二）所说的“这”、“此”、“这些”。如：

祚遂为璿所杀，璿后数见祚，部从铠甲，举手指璿云：

“底奴要当截汝头。”（北齐颜之推《还冤记》）

如果用在形容词或动词前作状语，则“底”有明显的修饰性，相当于“这样”、“这么”，上面转引的《汇释》中的例句就是这种情况。

突出语法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明确虚词的词性。如“被”在中古的典型用法是作为介词引进主动者，这为大家熟知，可是象下面的“被”就值得注意：

多被你一生在村泊，不知国法事如何，有多少蹉跎处，不忍对学。（《刘知远诸宫调》第三）

“被”介绍的不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句子，故这样的“被”已不是介词，而是连词，用来表示因果关系。我们在本书中就为“被”列有两种词性。

还如“定”在中古时常用在疑问句中表示进一步追问，相当于“究竟”：

只疏云梦，不知定梦，定觉耶？（《周氏冥通记》

卷二）

而后来在选择问句中前一个“定”省略了，只用后一个“定”：

不知我与影，为一定为二？（宋杨万里《夏夜玩月》）

这种“定”虽然来源于副词，可是词性变成了连词，表示选

择关系。

② 着重语法特征的描写。所谓的语法特征主要是指语法功能和语法意义的特点。作这些方面的描写，才能正确解释虚词，上面提到的“底”就是证明。而有些虚词的新变化也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有时是仅有语法功能的变化，语法意义不变。如“其”在上古及中古都是第三人称代词，意义不变。但“其”在上古一般只作定语，而中古时则可作主语、双宾语中的近宾语，还可作兼语。更多的情况是两者同时有变化。如“自”作为代词在上古时主要是作状语。而中古时“自”还可作定语：

辽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三国志·魏志·徐黑传》）

“自名”即自己的名字。

这一语法功能的变化亦带来语法意义的变化，即当叙述者的立足点从旁观者出发，那么“自”就由自称变为他称，相当于第三人称的领属者，即“他（们）的”。如：

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这些只有作语法的描写才能解释得清楚。

③ 注意阶段变化。中古还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其中还可分为若干阶段。不少虚词在这不同阶段的变化亦主要体现在语法特征上，作为断代汉语史虚词词典，当然最好能说明这些变化，这对研究、对阅读都有帮助。如“儿”是常见的后缀，在魏晋南北朝它还仅用于姓氏或姓名之后，带有轻蔑的色彩。在当时用于动物名称后的“儿”，一般还是个实词，指幼小者。到唐代“儿”的用法有明显扩大，普遍用作动物及其他物体的名称的后缀。在本书中对此就作了具体的说明。词缀“老”的情况亦相类似。

3. 追溯历史来源

中古汉语是汉语历史发展的中间过渡阶段，这一特殊性决定了本书除了正确释义外，还需做溯源的工作。

所谓溯源，有两种含义：

① 追溯新词、新义、新用法的较早使用时间。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唐人文字‘仅’多训庶几之几。”此说一出，几成定论，不少人都认为“仅”的这一用法为唐代所特有。其实这在晋代即有，在南北朝时已较流行。本书就采用了晋代的例证。还如“看”作为表测试义的语助词，张相提供的最早例证是唐代的诗歌，而追溯源头，则应始于南北朝。

有时中古的流行用法的源头还在上古后期，故编写中古的虚词词典还需注意到汉代乃至先秦后期的情况。如“何等”作为一个双音节疑问代词，在中古一直很流行，可是其产生的时代却可追溯到汉代，本书特意列了《史记·三王世家》中的例证。

在追溯源头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问题是正确选用可靠、确凿的较早的例证。首先要防止对某些词语的误解。如“着”(著)是个时态助词，一般都认为它产生于唐代，而几年前有人提出新说，认为它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曾举了六条例证，如：

从小微起，遂成大恶，皆由贪著财色，不能施惠。

(魏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卷下)

然而，仔细考察一下当时“著”的用法，就会发现这样的“著”其实并非是虚词。“著”在当时有“迷恋”、“沈溺”义，是个动词，故与近义词并列连用，“贪著”即“贪恋”。其他五条例证均是如此。这个“着”与后来的语助词“着”的来源毫无关系。

其次是要划清过渡状态的虚词与典型的虚词的界线，从而正确判断产生的时代。如“将”是用在动词后表示动态的助词，唐

代的例证如：

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唐白居易
《长恨歌》）

而魏晋南北朝时，有个别例证似乎很相仿：

〔唐遵〕暴病而死，经夕得苏，云：有人呼将去，至一城府。（《古小说钩沉·冥祥记》）

曹广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到宋代的“动+将”结构》（见《中国语文》1990年第二期）中全面考察了“将”的用法，发现在魏晋南北朝时用于动词后的“将”均有明显的“携带”、“挟持”义，而且与前一动词之间往往可插入连词或代词。他由此断定这一时期的“将”仍是动词，只是开始向助词过渡，真正的助词“将”产生于唐代。本书撰写此条时就采用此说。

与“将”相类似的，还如“得”，在魏晋南北朝时“得”一般用在有获得义的动词之后，仍应看成是连动式，到唐代才由此而真正变成助词。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古籍众多，语言情况又复杂，要真正找到所谓的始见书，有时是十分困难的。我们所能做到的只能是找到我们所见的尽可能早而且又确凿可靠的书证。有的问题仍需大家共同去探索。

② 追溯新词、新义、新用法的来历及演变的途径。这样做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有利于这些词义的考证，为自己的解释提供理据，可以使读者更加信服。如“更”作为副词，一般是表示程度的进一层，然而在魏晋时期又常常表示转折，相当于“却”、“反”。刘淇《助字辨法》卷四云：“更，改图也。与前义违，故得为反也。”也就是说“更”表示转折是由它的动词义“更改”引申虚化而来的，“更改”就是与原来的情况相反。讲明了这个道理，“更”的这个义项就更站得住脚了。

另一个作用是有益于汉语语法史的研究。对某些重要的虚词探索其来源及演变，本身就是汉语史的重要课题，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中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就占了大量的篇幅。而更重要的是，对大量虚词的来历及演变的追溯，还有助于我们去归纳、总结汉语语法史的某些基本规律。例如“爱”、“喜”、“善”这几个与心理、习惯有关的动词在中古几乎同时演变为副词，均有“容易”、“常常”义。第三人称代词“渠”、“彼”、“伊”到中古都有第二人称代词的用法。这说明在虚词演变中存在一种同步演变、类聚演变的现象，就是一些近义词不但意义相近，而且在语法特征的变化中亦有相近的情况，这也说明虚词的演变并非孤立进行的，而是相互有影响的。

由于古籍情况复杂，大量当时的口语材料的失传，溯源工作是相当困难的。有时会有不同的看法。如“所”作为疑问代词，周一良先生认为是“何所”的省缩，（见《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17页）太田辰夫先生则认为是由“关系代名词”转化来的（见《中国语文》1987年第6期《中古（魏晋南北朝）汉语的特殊疑问形式》）。还有不少虚词至今来历不明，无法溯源。本书的原则是慎重、宁缺勿滥。尽管如此，这一部分的内容，仍然可能是本书中最有争议的。我们只希望这方面的工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不认为可以作出定论。

4. 口语材料的运用

中古汉语与上古汉语的一个鲜明区别就在于言文的分离。吕叔湘先生为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写的《序》中说：“追溯汉语发展的历史，大概自古以来书面语和口语就不一致。秦汉以前，文献不足，难以详究，魏晋以后言文分歧的痕迹才逐渐明显起来。一方面，除古典散文继承先秦传统外，骈体文字越来越得势，离开口语越来越远。另一方面，短书杂记大量产

生，佛经译本也不避俗语，那里面常常可以遇到当时的口语词和口语词义。蓝生同志这本书的取材，还不免拘泥于‘小说’二字，我希望她将来修订这本书的时候能够放开手来，多方搜求，使它更加完备。”吕先生的这个希望对本书的编写亦至关重要。

魏晋南北朝的口语材料主要有：

① 翻译的佛经。吕叔湘先生说过：“白话的兴起跟佛教大有关系”。（《语文常谈》）尤其是那些叙述佛教故事的作品，白话成分更多。如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南齐求那毗地译《百喻经》、北魏慧觉等译《贤愚因缘经》、梁宝昌等撰《经律异相》等。

② 笔记小说。这是当时新兴的文学体裁，受传统的书面语影响较少，最著名的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还如鲁迅先生辑录的《古小说钩沉》，亦有不少口语成分。

③ 医农、科技著作。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酈道元的《水经注》。这些著作以实用为目的，所以语言亦较通俗，有一定的口语成分。

④ 民歌。《乐府诗集》中的一批南北朝民歌，显然是用口语撰写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过去大多数人认为是东汉的作品，而从语言上分析，很明显应该是东汉以后的作品，我们也把它划入这一时期。

⑤ 史书。如《宋书》、《南齐书》、《魏书》，虽然这些都是文人的正统作品，可是其中记叙的人物对话，有关案例的申述，来往的书信中都有不少口语材料。

唐五代的口语材料如：

① 禅宗语录。这是唐代才出现的一种佛教著作。高名凯先生在解放前就撰写过《唐代禅家语录所见的语法成分》，即根据这类口语材料研究当时的新的虚词。像产生于五代的《祖堂